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

冲突与融合

中国近代文学思想与中外文化交流

赵利民 著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青年

CHINESE
新青年杂志社

微象的阿普

阿普 阿普的阿普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

冲突与融合

——中国近代文学思想与中外文化交流

赵利民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突与融合：中国近代文学思想与中外文化交流 /
赵利民著.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2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
ISBN 7-80688-208-1

I. 冲… II. 赵… III. ①文学思想史—中国—近代
②文学思想史—中国—现代③文化交流—中外关系—
近代④文化交流—中外关系—现代 IV. ①I209.6 ②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7662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项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总编室)
(022) 23075303(发行科)
电子信箱：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天津铁路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210千字
版次：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全套定价：160.00元 本册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走向中西融合的中国近代文学观念	(1)
二、在古典与现代之间： 中国近代文论思想的新旧并陈与杂糅	(18)
三、审美与功用的对峙与互补： 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文学价值观	(36)
四、忧患意识与抗争精神： 中国近代悲剧意识论	(46)
五、中国近代悲剧意识的艺术实践	(54)
六、中国近代新学思想的诞生及其面临的问题	(78)
七、中国近代文学创作主体观念的嬗变及意义	(89)
八、从杂文学体系的解体到纯文学体系的初步确立	(114)
九、中国近代文学语言观的产生	(124)
十、报刊对近代文学语言观念变革的影响	(130)
十一、文体的解放： “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	(138)
十二、“新名词”在近代中国输入的文化内涵	(144)
十三、中国近代小说观念变革与日本明治政治小说	(150)
十四、域外小说翻译对中国近代小说观念变革的影响	(157)
十五、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观成因新探	(168)
十六、王国维悲剧观的实质	(179)
十七、王国维非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的意义	(193)

十八、正确评价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 (204)

十九、“不用之用”：

 早期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211)

附录：阐释与创造

 ——20 世纪儒家文艺思想研究概述 (219)

后记..... (259)

一、走向中西融合的 中国近代文学观念

费正清曾经指出，中国关于现代性的概念表现出一些不同于西方之处，“在中国，‘现代性’不但表示对当前的关注，同时也表示向未来的‘新’事物和西方的‘新奇’事物的追求。”^①事实也正如此。我们认为，国内学者所说的自新文化运动所开始的启蒙和救亡两大主题在近代就凸显出来了，二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用“二重变奏”来形容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恰当。要完成历史所赋予的这两大任务，近代人就必须要先来审视一下手中的“武器”是否能胜任其职。显然，再仅仅囿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观念，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用古老的传统学说也不足以抵挡坚船利炮的袭击。因此，中国人特别是一大批先进或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我的文化心态，即使是晚清政府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一味固守国门的消极后果，于是，近代中国自从鸦片战争起，便逐渐以较为开放的态度来对待西方世界。其过程虽然极为艰难，甚至是以血的代价才换来了开放的“世界眼光”，但中国人“天朝帝国”梦的保守心态最终被击碎了。具体到思想文化领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出于不太相同的目的，对西方文化采取了借鉴和吸收的态度，正如梁启超

^①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61~562 页。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指出的，是“以其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文明的进步存在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的矛盾与统一过程之中。就中国近代文化和文学观念而言，其中存在着诸多对立及冲突，如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就表现为近代历史上所出现的多次“教案”与教会的斗争，它们一直贯穿在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但是，走向中西融合在近代来讲，毕竟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这种“融合”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非自觉的。而国门一旦打开，作为不同质的异质文化就会与本土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吸引。英国民族学家弗里斯曾精辟地指出：“各族的联系及其文化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步的力量主要推动力。”^①社会文化发展史已充分证明：一种文化如果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不与异族文化相互交流，它必然会失去活力，最终将走向消亡。

近代早期的先驱者并没有特别自觉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力主学习西方，融合中西，而往往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目的，不得不向西方借鉴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政治文化制度。张罗澄在《时务论》中便透露出这种心态：“窃思中夏被先圣先王之深，崇尚王道，一旦用夷变夏，人心本难自安。但以时事孔棘，亟在燃眉，参用西法，克图速效，转贫弱为富强，亦维持世变不得已之苦心也，而必黜者，亦未免拘于墟耳。”显然，他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技术或现实层面来考虑学习西方的，尚未在文化心理的层次上思考问题。然而，能够迈出这么一大步，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当然，中外交流并非自近代始，从东汉印度佛教的传入到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的接触，都曾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就其自觉

^① 转引自〔苏〕C.A·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程度而言，中国近代人是以“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自主姿态接受西方文化观念的；而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看，也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致力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始终贯穿于整个近代历史。鸦片战争之后、甲午战争之前，基本上是文化上的“中体西用”论占主导地位。魏源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其原因是除西方的舰炮比中国厉害之外，更主要的是中国国内政治的弊端。他说：“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才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之处，以之治材材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羸，以之练士则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①因此，在魏源看来，中国目前所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痛、去营窟，同时必须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虚心向西方学习，他说：“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者之旷识。”而不应“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魏源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后来，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采西学”、“制洋器”，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同魏源一样，他所持的观点是：传统文化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中国所缺乏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在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方面学习西方，但已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态度。至洋务运动，便发展成为对待西方文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原则。“中体西用”主张中国传统文化是处于本体地位，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上，中国文化可以对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进行吸收和利用，这就是张之洞所说的“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

^①《圣武记叙》。

“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①显然，“中体西用”所持观点是用“中学”去包容“西学”，“中”与“西”并不处在平等对话的同等地位上。但是，我们认为，提出“西学为用”比盲目拒斥外来文化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它表明中西文化相互融通自觉阶段的开始。从甲午战败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更为深层的反思，对西方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潮及政治制度表现出吸收借鉴的态度。康有为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②的主张；严复倡言：“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③在中西学术与文化的融合与会通方面，王国维更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实绩。他曾针对张之洞等提出的“中体西用”之说，明确阐述了他对“中学”与“西学”的看法，认为“学问之事本无中西”^④，“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绝对不能“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⑤。他将西学进入中国看做是打破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发展停滞局面的最好契机，因此力主二者的相互化合，将中学作为“体”被王国维讥为“无稽之谈”。鲁迅所提出的“别求新声于异邦”是他对西方文化态度的最好说明。孙中山也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他说：“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⑥孙中山还曾明确地承认他的学说是融合了中西方思想的，“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

① 《劝学篇》。

②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95 页。

③ 《严复集》第 3 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60 页。

④ 《国学丛刊序》。

⑤ 《论近年之学术界》。

⑥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60 页。

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从以上诸人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逐渐走向较为科学的道路上来了。

与“五四”时期激烈的反对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态度相比，近代人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应该是较为公允的。而新文化运动时期，将中西文化加以绝对对立的做法随处可见，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的观点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

（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黜武穷兵，国之大戒。……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东洋民族或目为狂勇，但能肖其万一，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处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力；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三) 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走极端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必然是“全盘西化”的主张。尽管胡适也曾有意对“全盘西化”的提法做出过一些矫正，如他说：“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①但他毕竟说过“我很明确地指出文化折中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②。胡适的意思基本上还是以西方文化代替中国文化。人们对此进行解释时所拿出的最为常见的理由是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的理论。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个人意志在其中虽起一定作用，然而，它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因此，我们不能以今人的价值取向的标尺去剪裁已经过去的历史现象。对待新文化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激进主义倾向，我们不能轻易地加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次伟大的行动，它提出了新文化建设的目标。但是，客观地讲，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主张一旦落实到行动上便会带来一些极为恶劣的后果。传统虽然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斩断、抛弃的，但“打倒”的口号一经喊出，它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现时代的成分也就会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有学者著文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认为自“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来，中国文论乃至中国文化在发展轨迹上便“呈现出一条巨大的断裂带”。^③这一观点对中国文论及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的估计也许过分悲观了一些，所谓“巨大的断

①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② 《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页。

③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裂带”云云未免亦有夸大其辞之嫌。然而，在这世纪的交替时期，回眸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五四”文化革命的偏激心态是有其泛滥的弊端的。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迎接 21 世纪的时代转折点上，对待未来中国文化及文论建设必须采取科学审慎的态度。为了“走向世界”，很可能会出现两种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其一是过分夸大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实力；其二为急于与西方“接轨”将中国传统文化一脚踢开，与西方文化过分热情地拥抱。以上二者都是不可取的。而实际上这两种态度从“新时期”以来已表现得够明显了。我们不想简单地开出“药方”来指出发展中国文化的途径，只是想提醒人们注意吸收近代人的经验，注意借鉴“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教训。近代文化先驱在文化问题上所做出的清醒的反思也是后来者所无法比拟的。梁启超曾做过深入的检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①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近代学者在汲取西方文化时是有些“饥不择食”的，这反映出近代文化是不成熟的。但也应该看到，在努力保持传统文化优良成分基础上，大胆汲取外来文化而致力于中西融合的尝试所带来的近代文化的勃勃生机。

作为近代文化的一个因子的近代文学以及关于文学的观念，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同样出现了对西方哲学思想、西方文学观念有意识吸收和学习的局面，以传统儒学为基础的文学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近代文学观念在外来因素刺激之下甚至出现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 1936 年版，第 71 页。

了多元化的趋向。对域外文学观念的接受也经历了由简单模仿到相互对话、相互融合的过程。这里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是：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在其形成过程中究竟是以哪些方式与西方观念发生碰撞并为我所用的。

第一，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大量吸收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学说和哲学理论。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等社会学、哲学流派都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产生了较大影响。哲学思想对文学观念的影响在西方文学世界中是非常明显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任何文学理论流派都有其哲学基础，也正是由于哲学对文学的影响，西方不同文学理论流派的特征才显得极其鲜明，进而形成了流派林立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也有其哲学基础，如我们常说的儒家文学观念、道家文学观念等等也是着眼于其哲学基础而言的。也许是由于传统诗学不太注重思辨以及在此思维方式影响下所形成的表达方式的缘故，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中的哲学气息就显得不够充分，没有形成一个流派超越另一个流派，从而出现峰峦叠起的形势。然而，到了近代，中国文论家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用西方哲学观念来帮助构筑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或以之为理论方法阐释中国文学现象。对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产生较大影响的有进化论、人道主义、惟意志论、实证主义哲学思潮以及民权学说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首推进化论和惟意志论。

首先来看进化论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出于变革和革命的需要，在戊戌前后至“五四”前后从西方引进进化论，对中国近代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谓中国近代的第一大思潮。有人曾这样描述进化论处于热潮时的情形：“我们放开眼光看一看，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界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①“物竞天择之理，厘然

① 陈兼善：《进化论发达略史》，《民铎》3卷5号。

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①甚至“《天演论》便变成一般救国及革命人士的理论根据，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等名词，也便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了。”^②可见，它的影响面之广、影响度之深。进化论作为近代人接受的文本，其接受效果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王国维、胡适、陈独秀等诸位大家所理解的进化论存在许多分歧，运用进化观念所解决的问题也是各不相同的，但对进化论基本精神的把握还是比较一致的。就其对近代文学观念的影响而言，也是十分明显的。

就文学表现的内容而言，进化论为近代文学家提供了立论的基础，在进化论信奉者看来，人道主义的兴起，个性解放的勃兴是符合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的，因此，严复认为“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他坚信“世道必进，后胜于今”^③。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就是受益于进化论的，他在著名的《人的文学》中指出：“我们要说的人的文学，须得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并说因第一个要点，故而人有“肉的一面”，因第二个要点，故而人有“灵的一面”。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近代文学家也是常常用进化论思想来论证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进而形成了带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观的。梁启超的文学进化观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学语言的进化，“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

① 《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号。

② 王棊：《严复与严译名著》。

③ 《天演论》按语，《严复集》第5册，第1359~1360页。

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佐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①。其二，为小说体裁的进化。梁启超的观点得到了时人的响应，如楚卿（狄葆贤）说：“饮冰室主人常语余：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②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更是明确从进化论角度出发来讨论以白话取代言文的必要性的，“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他还指出：“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而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知道国语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生。”^③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任何事物“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的革命与进化的关系原理说明白话文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总之，因为近代学者往往以“进化”的眼光看待其他新思潮的出现，因此进化论思潮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

再看做为人本主义哲学流派的唯意志论对近代文学观念变革的影响。惟意志论的代表理论家是德国的叔本华和尼采，但它的形成却是建立在接受自古希腊以来特别是近代哲学（如卢梭的社会学说、康德的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惟意志论哲学用“意志”来解释自然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它把人的“主体性”强调到了极致。这一思想在中国近代引入是因为它恰恰适应了近代知识分子反对传统伦理、要求个性解放的需要。它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影响是从人学本体论的角度发挥作用的。

① 《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1903年）。

② 《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7号（1903年）。

③ 《白话文学史》。

王国维对惟意志论哲学美学思潮的接受在近代是最具代表性的。《〈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惟意志论学说为依据，认为人生之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是合而为一的，人类要摆脱痛苦必须寻求解脱之途径，而文学艺术是其中一种方式，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之上，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堪与世界一切伟大著作相媲美。王国维的结论显然曲解了《红楼梦》的本意，但以叔氏哲学来阐释这部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它的价值所在。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首先以西方理论展开对中国文学的评论，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新体系，打破了传统文学评点式的批评方法，从系统挖掘文学作品的内涵意义上讲显然是传统文学批评所无法比拟的。

对于王国维的“境界”说，学界流行着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即认为它集了中国传统意境理论之大成。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王国维的“境界”说可以说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结晶（陈寅恪语）。清末民初的《国学月报》在介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时说它“是用新的眼光，观察旧文学的第一部书”。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称赞《人间词话》，“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可谓评价甚高，几乎算得是中西融合的典范之作了。王国维确实是在借鉴传统意境论的同时，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理论融入其中，因为它融合得如“水中之盐味”，人们才不易发现它所受西学之影响。其实，如仔细考察，便可见出“西学义谛”。王国维提出：“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这其中的关键词“观”就是叔本华美学的“直观”或“静观”。已有学者指出：“王氏所谓‘能观’，意谓诗人在对某种客体的直接观照中形成的一种超越时空的‘领悟’，叔本华称之为‘审美的领悟’。而‘能观’的关键在于：审美主体本身‘合乎自然’，摆脱‘意志’的束缚，忘掉个体的存在，而‘自由’地进入审美

观照之中。”^①佛维在对“境界”说与叔本华哲学之关系充分论证的前提下也指出：“王氏的‘合乎自然’与‘邻与理想’二者结合的‘意境’说，跟叔本华所谓后天的‘自然物’与先天的‘美之预想’（理想）二者‘相合’的审美‘理念’说，渊源甚深。”^②“境界”说可以说是中西融合的一个较成功的代表。

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哲学思潮的其他流派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产生直接影响的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总起来讲，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使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受到冲击，它促发了具有新时代文化特点的新文学观念的形成。

第二，中西文学观念融合的另一形态是以西方美学或文学理论的范畴或概念对中国文学进行分析研究，或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寻找理论上的依据。梁启超对小说社会作用的极力强调不排除传统“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但对新的小说观念产生最为重要影响的还是梁启超所注意到的西欧各国及日本明治时期对小说的重视。梁启超特别强调指出：“西国教科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伙。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③康有为也注意到了西方社会对小说的青睐：“泰西尤隆小说学哉！日人尚未及是。”^④同时，翻译小说在近代的大量出版也带来了西方小说观念，进而对中国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梁启超还吸取了西方文学理论流派的观点运用到中国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中。例如，他对屈原的研究就运用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理论范畴。梁启超指出：“楚辞的特色，在替我们开创浪漫境界，常常把情感提往‘超现实’

① 潘知常：《美的冲突》，学林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31 页。

② 佛维：《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7~188 页。

③ 《蒙学报、演义报合叙》。

④ 《日本书目志·识语》。